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青年学者论丛

开创：邓小平与改革开放

桑东华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青年学者论丛

开创：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

桑东华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创:邓小平与改革开放/桑东华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5.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青年学者论丛. 第2辑)

ISBN 978-7-5098-2939-4

I. ①开… II. ①桑… III. ①邓小平(1904~1997) — 人物研究

IV. ①A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6085 号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 潘 鹏

复 审: 韩冬梅

终 审: 汪晓军

责任校对: 龚秀华

责任印制: 谷智宇

责任监制: 贺冬英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b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45mm×210mm 1/32

字 数: 143 千字

印 张: 7.5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2939-4

定 价: 18.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 010-82517197

序

曲青山

经过中共党史出版社的精心谋划和充分准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青年学者论丛》第二辑正式出版了,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策划和出版青年学者论丛,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委会深化党史研究、加强党史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论丛第一辑出版后,得到党史学界同仁的赞赏和肯定,受到广大青年党史科研人员的欢迎和好评。

“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无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一个部门、一个单位,总是把希望和未来寄托于青年身上,这是自然的规律和法则使然。青年强,则国家强、民族强;青年兴,则部门兴、单位兴。我们每个热爱党史事业、走进中央党史研究室大门的人,都曾经或正在拥有一个“党史梦”,这个“党史梦”就是想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岗在职工作期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间，发出自己的一份光和热，为党史工作和党史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每每我与室里的老同志交谈时，他们回忆起以前走过的峥嵘岁月，无不流露出执着和眷恋之情，这一切深深地感染着我，打动着。我听，总会说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党史工作者或党史人。

应当说，“党史梦”是中国梦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梦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这个命题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形象表达和生动表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都有可能，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创造出来。中央党史研究室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国家队，是为我们党编修“红色家谱”的。我们在这里工作的每一个同志，都应该编织和追求自己的“党史梦”，为实现中国梦而加油助威、增砖添瓦，这是必须的，也是应该的。

那么，我们的“党史梦”凭什么去支撑、靠什么去实现呢？凭、靠的方面和东西很多，但根本的一条是党史研究。前不久，我在中央党史研究室青年沙龙的讲话中曾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中央党史研究室要以党史研究立室；第二句话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人员要以科研立身；第三句话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希望和未来在青年人。我们应该在全室甚至是在全国党史部门叫响这三句话，形成党史工作者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我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就是说培养

人才是一项艰巨任务，是一个系统工程，非一朝一夕之力，非一蹴而就之功。必须未雨绸缪，及时谋划，采取措施，久久为功。而党史学科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个学科出成果、出人才周期长，付出得多，要有长期积累和刻苦钻研的历练，要有耐得住寂寞，经得住清贫的意志和毅力。“以苦为乐”、“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应该是我们党史工作者的品格和精神追求。

“万事开头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既然我们无悔地选择了党史事业，我们就应该无怨地将其作为事业去奋斗，而不要仅仅将其作为吃饭的职业。青年党史工作者尤其应该志存高远，鲜明而坚定地确立这一点。在确定志向和奋斗目标时，有没有这一点，至关重要。党的事业薪火相传，需要青年人。党史事业、党史研究依然如此，也十分需要青年人。我们应该接续接力，将党史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从我室和全国党史部门的现状看，这个问题已经十分紧迫、十分突出地摆到了我们面前。

正是鉴于这一点，中共党史出版社向室里主动请缨，提出出版青年学者论丛，奖掖人才，扶持后俊，为党史队伍建设出绵薄之力，这是值得称道的一个善举，得到了我室科研部的大力支持。在这里，我愿借此机会，表达这样一层意思，就是期望中共党史出版社能够将这一做法坚持下去，并在我室科研部的指导下，不断探索新的途径和形式，继续为培养党史青年人才发挥作用。

这次编辑的丛书与上次不同，不是收录室里青年科

研人员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党史学术论文，而是以每个青年人员研究的专题出版小专著。这些专著大部分是他们的硕士或博士论文，所以是下了功夫的。而且在编辑时，我室科研部、出版社又请专家进行了审稿，并提出了修改和完善意见，因而这些作者虽然年轻，但其成果我认为是有学术价值的。丛书选题横跨中共党史的三个历史时期，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揭示，又有对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既有对党史全景式的描绘和勾勒，又有党史专题的论述和阐释；既有对解密档案的分析和利用，又有研究方法的创新 and 尝试。当然，作为青年人员的初步研究成果，也还有许多需要深入的方面和进一步完善的地方。但总起来说，是瑕不掩瑜。

中共党史研究是一个大领域，中央党史研究室是一个大舞台，从事这个学科的年轻人面临着无数的难得机遇。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让我们做好准备，在党史研究的广阔空间里，施展自己的才华吧！

“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我们企盼着从现在我室和全国党史青年工作者中能走出几位像我们的党史前辈一样的党史大家、名家。我想只要我们矢志不渝，戮力同心，刻苦钻研，奋力拼搏，这一点是会做到的。

应邀写了上面这些话，不当之处，请指正。是为序。

2014年7月17日

目 录

- 一、领导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 1
 - (一) 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 1
 - (二) 主持起草历史决议 / 15
- 二、推动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 / 29
- 三、绘制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 / 47
- 四、全力推进改革 / 60
 - (一)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 60
 - (二) 支持农村改革 / 75
 - (三) 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 89
 - (四) 架构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思路 / 103
- 五、决策对外开放 / 119
 - (一)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 119

(二) 倡导试办经济特区 / 131

(三) 促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 / 138

六、为改革开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 150

七、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构想 / 163

八、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 180

(一) 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和外交政策的调整 / 180

(二) 致力于中美关系正常化 / 191

(三) 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 210

后记 / 227

一、领导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领导和开创中国改革开放，首先是从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破题的。30多年前，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他以其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强调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通过这场大讨论，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廓清了道路。

（一）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1

历史的变迁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然而，当人们透过现实回眸历史，却能听到它前行时那凝重的足音。

20世纪70年代末，刚刚走出十年浩劫的中国乍暖还寒，“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人民要求彻底纠正“文化大

革命”错误，希望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期盼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要求翻开历史新的一页。然而，人民的愿望和国家的发展却遭到了严重阻碍，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面临着巨大阻力。

当时，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特别是延安整风形成的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已经被破坏得面目全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盛行，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成为禁锢中国人民思想和行为的精神枷锁。1977年2月7日，一篇《学好文件抓好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有名的“两个凡是”。“两个凡是”有深刻的政治含义，作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敢于根据实际情况，形成新思路、新方法的人往往动辄得咎，处处被掣肘，直接制约着各项具体工作的顺利开展。“两个凡是”与结束“文化大革命”、发展经济的要求是相悖的，坚持“两个凡是”就不能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就无法走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也就无法开创中国发展的新道路。要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生死攸关的第一步，是必须在思想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破除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的现代迷信的阴影，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和“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历经政治磨难的邓小平表现出大智大勇。“两个凡是”提出后，尽管尚未恢复领导职务，但他仍然从全党全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出发，率先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

1977年4月，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①5月24日，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邓小平再次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如何对待毛泽东说过的话，“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②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对于理论战线和其他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起到了理论先导的作用。此时的邓小平还没有恢复领导职务，处在那么微妙的地位却敢于如此直率地讲话，这就是他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复杂政治环境中锤炼出来的特殊性格和大无畏精神。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

历史最终选择了邓小平。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复出。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两次陷入逆境，但他再度出来工作时，仍毅然决然地表示：“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这就是邓小平，中国人民的真诚儿子！当历史再次选择了他，当祖国和人民需要在他的带领下去实现百年图强的梦想和宏伟目标时，他以他的高度智慧和雄才大略，以及无私精神开始领导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在这次全会闭幕时，他再次强调：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中“最根本的东西”，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对端正党风、军风、民风“特别重要”。^①

随后，在中共十一大上，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在同一些部门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反复讲：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不能以毛泽东同志是否画圈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而应当实事求是。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倡导下，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的呼声愈来愈高，最终汇成了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62—163页。

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这场讨论的序幕。该文提出了一个虽属马克思主义常识但已久被遗忘的重要观点：究竟什么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还是领袖的决策和指示。一系列在当时振聋发聩的观点被提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且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个革命政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必须由社会实践来检验；任何思想、任何理论必须无例外地、永远地、不断地受实践的检验；任何思想、理论，即使是在一定的实践阶段上被证明是真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而得到补充、丰富或者纠正。显然，这是从根本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

一石激起千层浪。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应该说，最先对文章作出反应的不是赞同而是责难，是来自中央高层和宣传部门负责人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篇文章的倾向是错误的，是反毛主席的，从根本点上动摇了“两个凡是”的根基，势必引起人们思想混乱，因此主张不要再扩散这篇文章的影响。但是，这种责难主要发生在宣传部门的领导层面，并没有扩散到社会上。因此，在文章发表后的一段时间内，一方面，文章的组织者们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全国有30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直到7月

中旬，并没有出现大讨论的迹象。

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邓小平当时并没有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得厉害，才找来看了看。他认为这篇文章是符合马列主义的，是扳不倒的，并以其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很快认识到这一问题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具有的重大政治意义，他开始明确、坚定、毫无保留地予以支持。

5月30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人谈话时，有针对性地讲：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①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更为充分和明确。他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他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20页。

发点、根本点。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强调：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他还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他要求全党“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①这篇讲话，对当时面临重重困难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

此后，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真理标准讨论顶着压力艰难地向前推进。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3—119页。

2

实际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真正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讨论是从1978年7月中下旬开始的。特别是7月17日至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组织的来自全国的160多人的大讨论,可以看作讨论由自发到有组织,由局部推向全国的开始。而这种局面的形成与邓小平的两次重要谈话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随着形势的发展,党内和社会上批评“两个凡是”呼声渐高,但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依然利用各种场合压制群众的积极性。6月15日,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指责《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单位负责人把关不严,党性不强,要“接受教训,下不为例”。这实际上是下禁令。

为了使刚刚兴起的真理标准的讨论能够开展下去,关键时刻,邓小平采取了果断措施。7月21日,他找中宣部部长打招呼,要求中宣部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①第二天,邓小平又找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胡耀邦发动的这场讨论。他说: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些书啊!是个好班子。他说,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②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45页。

② 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45—346页。